

长江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 刘汉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富有的深刻内涵。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是中华大地的筋脉,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脉,其丰富的水土资源、深厚的人文底蕴孕育了解煌灿烂的长江文明。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长江文明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加强文化资源保护,推动文化创新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长江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文脉千秋在,江河万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许多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文字语言从未中断、中华文明传统一脉相承、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等方面,更体现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共同记忆和文化价值传承之中。长江文明是底蕴深厚的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江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中华先民持续生活在古老的长江流域,繁衍生息、接力前行。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群、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四川阿坝金川刘家寨遗址、四川甘孜稻城皮洛遗址等考古发现,证实了长江流域埋藏着从青铜器时代上溯到石器时代的文化链。长江流域的文化链内涵丰富、脉络明晰,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和传承的多元图景。玉蟠岩遗址、彭头山遗址、城背溪遗址、大溪遗址、油子岭遗址、屈家岭遗址等考古发现,生动展现了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屈家岭遗址的史前水坝,到始建于战国的都江堰、始建于秦代的灵渠、始建于东晋的荆江大堤,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丹江口大坝、陆水水库、葛洲坝及三峡工程,都表明长江水利工程建设历史悠久,展现了长江文明以造福人类为目标的重要特质。长江文明从未断绝的发展轨迹,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长江文明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长江文明正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奔腾不息、充满活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辉。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生发于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变革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创新体现在其既坚守“明体达用”的传统,又遵循“与时偕行”的规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长江文明一直在文明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华文明在历史纵深中既葆有根基的稳固性,又增添发展的开放性提供重要支撑。

长江文明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长江流域的中华先民创造出石斧、石锛等工具和石矛、石镞等武器,掌握了钻木取火、播种百谷等技术,高擎文明的烟火,走过了旧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湖南宁乡发现的晚商青铜礼器“四羊方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青铜通天神树”“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发掘的约7000年前的木制船桨、独木舟,以及众多已发掘的青铜器、船板残片、陶瓷器、铁器、玉器、炭化丝绸,充分展示了长江流域先民对于创造性理念和先进铸造工艺的理解和掌握。先秦时期,楚文化成为长江流域文化代表,涌现了首创县制、改革赋税、重视科技、军事优先等治国方略,老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思想精华,以及屈宋楚辞、编钟乐舞等文化成果,开风气之先,代表了长江文明的一个高峰,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历史上长江流域形成的生产力和文明形态,推动绵延不断、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在创新中永葆蓬勃的生命力。

长江文明追求大同、向内凝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百川东到海,万流总归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长期以来,“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深深熔铸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之中。长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多源合流、百川归一,既是长江的地理特征,更是长江文明的突出特质。长江流域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多元融合和相互认同的文明图景,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缩影。

长江文明追求大同、向内凝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共居长江之畔,同饮长江之水,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图“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古代中央王朝对长江流域民族地区,先后采取过羁縻政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政策,打破了“汉不入蜀,蛮不出境”的状况,出现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局面,促进了长江流域云、贵、川、

桂、湘、鄂地区的民族融合。“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等“大一统”思想推动了长江流域各民族、各地区的稳定发展。长江流域的各族儿女血脉相通、命运相连,在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中一呼百应、同心协力,谱写了保卫长江、维护统一的壮丽史诗,形成和强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长江文明的这种特质,厚植了中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深深体现和助力筑牢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长江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长江流域水网密布、支流众多,其地理跨度长、地势落差大、地形地貌差异大,造就了通江达海的地理特质,成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长江开放包容的地域特性天然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同文化在此交汇、互鉴共生,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明生态。

长江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三苗、百越、百濮等部族在长江流域开辟地盘,古蜀国、巴国、楚国、吴国、越国在长江流域安营扎寨,东晋与南朝的陈、齐、梁、陈在长江岸边的建康建立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吴、南唐两代及吴越国、前蜀、后蜀、荆南国在长江流域建立,明朝在长江流域开国建都、奠基创业。这些朝代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发展轨迹,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实践成果,更在文化融通中体现了长江文明兼容并包的特质。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就蔚然成风,推动了文化融合。比如:羌藏、巴蜀、湘湖、荆楚、皖赣、吴越等文化区及海派文化通过长江相互交汇贯通;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相互激荡,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等等。无论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沉淀,还是不同文化的蓬勃发展,本质上都反映了长江文明对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长江文明这种突出的包容性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长江文明崇尚和合、遵行大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厚植于“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和平交流,主张友好往来,追求协和万邦,将“睦邻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 沈坤荣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作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出深刻论述,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科学指引。比如,《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等。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将稳就业摆在“四稳”首位;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深刻洞察内外部环境演变和就业矛盾变化,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不断探索就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就业促进规划和就业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深入理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数字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清醒认识就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才能准确把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时代特征,更深入理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秩序和贸易格局加速演变,更加碎片化的国际市场和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环境,导致全球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总体来看,世界经济既面临各种旧冲突尚未解决带来的成本累积,又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博弈格局不确定性带来的新冲击。我国在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办好好自己的事,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就业政策举措出台,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8%;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去年同期持平。正是因为采取了稳就业稳经济的若干举措,在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事实表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是加强民生保障的必然要求,更能增强维持经济韧性、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底气。

国内新旧增长动能转换增加结构性失业。习近平总书记

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经济整体呈现回升向好趋势,但国内有效需求依然偏弱,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在产业形态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就业结构与岗位需求也面临深刻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当下,“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劳动力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体现,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催生大量知识密集型岗位,但一部分劳动者现有知识技能结构难以适应这些岗位要求。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劳动力供给结构调整,大龄劳动者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步提升,而大龄劳动者知识技能转型较为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技能供需不匹配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此外,劳动者求职预期和就业观念与企业招工用工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如制造业、家政服务行业长期面临“用工荒”,企业在招工时候向专业化、年轻化的劳动者,但这些行业对新生代劳动者吸引力不足。结构性就业矛盾既是长期性难题,又是深层症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根本途径。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对传统就业岗位需求造成一定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当前,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加速向千行百业渗透,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趋势深刻影响传统的生产方式,对传统就业岗位造成一定冲击。数字技术的岗位替代效应显著减少了低技能就业岗位。例如,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降低了对于执行常规性、重复性、标准化工作任务的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负面冲击,形成技术性失业。同时,数智技术的岗位创造效应催生远程工作、人机协作等多元工作方式,刺激智能化相关职位需求快速增长。与快速迭代的数智技术相比,劳动力技能提升速度相对较慢,因而短期内稳就业依然面临较大压力。从长期看,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更多元化的新就业形态将广泛衍生,形成新的岗位需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探索数智技术助力就业的新路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必须聚焦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面对内外部环境演变和就业矛盾变化,只有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好自己的事,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于重点领域加力挖潜扩容就业岗位,才能有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支持经营主体稳岗扩岗,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弘扬企业家精神》中指出“当前,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关爱员工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同员工携手渡过难关。”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对于稳就业、保民生至关重要。受到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影响,涉美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稳岗压力面临较大挑战,稳岗压力沿着外贸产业链向上下游配套企业蔓延。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影响,需要以支持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为抓手,建立援企稳岗常态化机制,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贴、重点群体税收优惠等政策。对于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大的企业,要从供需两端发力,用好用足存量政策,迅速推出增量政策,提前研究储备政策,更大力度减负稳岗扩岗。

打造就业友好型企业,积极顺应增长动能转换。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指出:“把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城镇产业发展和乡村产业培育都要重视扩大就业容量。”基于经济发展长周期视角,只有积极应对增长动能转换,打造就业友好型企业,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努力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质量岗位。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增强新兴产业的就业吸纳效应;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扩容提质相协调。健全就业监测评估机制,推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岗位创造、失业风险评估同步开展。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努力拓展就业增长空间。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要把握好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的平衡点,既要坚定不移加快创新,也要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特别是教育和社保政策,解决增强劳动人口就业能力和保障基本生活问题,确保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走向深入,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竞相发展,催生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岗位需求,支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就业形态呈现数字驱动、网络支撑、平台协同的灵活用工新特点,成为吸纳就业的新“蓄水池”。与此同时,新就业形态存在社保覆盖率较低、劳动收入波动较大、职业发展相对受限等短板。要辩证看待数智技术创新发展对就业造成的冲击,积极适应数智时代就业新变革新趋势,在把握数智技术发展新机遇、构筑数智时代大国竞争新优势的同时,通过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等方式,放大数智技术就业创造效应,努力拓展就业增长空间。

加强政策协同,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充分就业,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把握时代特征、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服务精准、管理科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友邦”“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等理念世代相传。长江文明推崇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既直接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又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

长江文明崇尚和合、遵行大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长江文明以农耕文明为根基,以文化包容为纽带,以交流互鉴为路径,为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提供了深厚滋养。比如,千百年来,景德镇瓷器入长江、通外洋,走向世界、风行天下。借助长江水系,景德镇瓷器走昌江、进鄱阳,或逆赣江而行过大庾岭,到岭南出海,或从湖口进入长江,然后一路顺江而下,经南京、扬州入海,沿东南沿岸进入南海,踏上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逆江而上,经汉口、进汉江,过河南、入山陕,从右玉走西口,辗转陕西、河套进甘肃,走西域丝绸之路;或从张北走东口,走上草原丝绸之路。16世纪的英国博物馆地图上,中国城市只标有3个,景德镇就是其中之一,足见其影响力。

又如,中蒙俄万里茶道借助长江水系,成为中华文明和欧亚文明相互交流的文化共享之路,在世界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它从福建武夷山下的梅口镇开始,经江西铅山的河口古镇进鄱阳湖、走长江,与从湖南安化、湖北赤壁出发的茶道在汉口汇合,逆汉水到襄阳,从河南到山西,走上蒙古草原,再到达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和俄罗斯的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

再如,长江流域自古商贸繁密、商埠繁多,商路辐辏、商贸云集,以丰富物产和便捷交通,加强了商品与文化交流互动。商人们“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古代“四大米市”无锡、长沙、芜湖、九江兴盛于长江之滨;唐朝时扬州成为中亚地区粟特商经营珠宝的集散地,来自长江流域的稀有物资,尤其是丝绸、陶瓷、茶叶等汇聚于丝绸之路,远销地中海地区和非洲东海岸;等等。

长江文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我国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长江文明所蕴含的开放包容理念,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重要助力。明代郑和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的金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漆器、丝绸、茶叶、谷物等中国特产,播撒下和平与友谊的种子,促进中外贸易融通和文化交流,再次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之中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对外交流理念。

江流天地,长波万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对长江文明的高度重视和深刻把握,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长江文明、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明,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必将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和现实创造力。

(原载8月21日《人民日报》)

理增长。

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强化就业政策与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推动各领域各环节紧密配合、协同共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丰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打造就业友好型政策。一是推动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机衔接。统筹推进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转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扩容提质相协调。二是加强就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联动。积极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三是强化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推动就业政策与分配政策协同发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为灵活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构建高质量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与就业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指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时俱进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一是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体系。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领域的立法与劳动争议调解等工作,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建立健全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二是加强对重点就业群体的就业支持与引导。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政策,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三是加快构建就业质量评估体系。探索确立有助于就业政策落地、可供国际比较的就业质量评价标准,可从就业环境、劳动保障、重点行业与重点群体就业情况等就业质量维度,探索设置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

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构建匹配产业发展的劳动力资本积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提升就业质量,必须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只有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更好保障人的尊严,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才能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要健全数智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数智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数智技术资源供给体系,打造数智技能重点攻关平台。优化劳动者职业培训和发展环境。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培训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优化劳动者职业发展环境,健全人才评价选拔机制,拓展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原载8月22日《人民日报》)